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6.014

# 《我们的婚姻》：都市题材电视剧 女性叙事视角之新变

刘雪姣, 刘世浩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都市题材电视剧《我们的婚姻》以全职妈妈沈慧星重返职场所引发的一系列家庭矛盾为主线, 串联起另外几对年轻夫妻在婚姻与事业关系上的冲突与和解, 多层次、立体化地呈现了当下都市女性的生存境况, 表现了她们在平衡事业与家庭之间关系的努力, 以及她们在性别、身份认同与家庭生活之间重新建立起主体意识的探索过程。与以往同类题材剧集在女性叙事视角下突出性别对立的情节设定不同, 《我们的婚姻》肯定了都市女性在平衡婚姻家庭与事业之间关系方面的努力, 在叙事风格与主题立意方面展现了两性关系由分裂到融合的转变。

**关键词:** 《我们的婚姻》; 女性叙事视角; 主体意识; 自我价值

中图分类号: J9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6-0108-07

## Modern Marriage: New Changes of the Female Narrative Perspective in the Urban TV Series

LIU Xuejiao, LIU Shih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urban TV series *Modern Marriage* takes a series of family conflicts caused by the return of full-time mother Shen Huixing to the workplace as the main line, connecting the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marriage and career of several other young couples. It presents the current living conditions of urban women in a multifaceted and three-dimensional way, showing their efforts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and family, and their exploration process of re-establishing subject consciousness between gender, identity and family life. Unlike previous TV series of the same theme, which highlight the plot setting of gender oppo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ale narrative, *Modern Marriage* affirms the efforts of urban women in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riage, family and career, and shows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der relationship from separation to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narrative style and theme.

**Keywords:** *Modern Marriage*; female narrative perspectiv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self-worth

收稿日期: 2024-06-28

作者简介: 刘雪姣,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浙江师范大学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文学。

近年来,国产电视剧创作领域出现了多部以反映都市女性情感、职场经历与婚姻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剧集,由于其所涉及的问题都是极具代表性的社会议题,因而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些剧中既有反映全职妈妈生存境况者,如《我的前半生》;也有以大龄女性所面临的性别困扰与职场经历为核心内容者,如《三十而已》;还有表现女性在特定行业中的历练与成长的故事,如《安家》《理想之城》;等等。珠玉在前,《我们的婚姻》如何呈现其特殊性?一言以蔽之,如果说以往的同类题材剧集聚焦于女性在职场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的话,那么,《我们的婚姻》则尝试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同时其叙事手法也体现出新的特点。其中,事业与婚姻家庭的融通、女性个体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回归、自我与他人相互间的理解包容,成为该剧独特的审美价值诉求,创作者试图在此基础上引发观众对都市女性生存困境以及如何打破这种局面的深刻思考。

### 一、分裂的性别叙事成为叙事鲜明特征

文艺创作是社会的投射、时代的号角。随着女性意识的进一步觉醒,相关的讨论引发了新一轮“她题材”影视剧创作热潮。与此同时,影视剧创作对女性话题的关照也借助女性主义叙事框架展开。美国叙事理论学家沃霍尔认为,所谓女性主义的叙事视角指的是研究性别与叙事的关系以及“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中关于性别的假设对叙事形式的影响”;“通过分析性别与叙事的影响,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人物(性别特征、典型人物、人物意识)、情节(主要情节、成规、故事结尾)、叙事过程(谁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向谁叙述)”,借以发现文本中所隐含的性别叙事模式和性别化的写作行为<sup>[1]</sup>。文学作品如此,电视剧作品亦如此。基于女性视角的叙事方式,旨在表现女性人物如何在男权社会文化语境中突破潜在的性别歧视、确认自我价值、坚持独立精神的探索过程,成为当下一些都市题材电视剧作品的叙事特征。

#### (一) 展现都市女性在职场与婚姻家庭之间的挣扎

展现都市女性在职场与婚姻家庭之间的挣扎,是近年来都市题材电视剧的重要特征之一。从《欢乐颂》《我的前半生》《北京女子图鉴》,到《我

们都要好好的》《三十而已》,都是以都市职场生活为背景去探讨女性的职业困境与情感纠葛的。然而,“过于悬浮的人设与剧情”,使这类剧集“只是换上了女性职场剧的‘新瓶’,而不脱偶像剧、爱情剧的‘旧酒’,更与女性独立关系不大”<sup>[2]</sup>。《北京女子图鉴》中,陈可在北京的奋斗过程中融入了大量爱情剧元素;《我的前半生》中,罗子君在闺蜜唐晶和密友贺涵的帮助下一路开挂,完成了职场逆袭。诸如此类的情节安排,都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剧情本身的思想内涵,使得人物缺乏思想内核。另外,此类剧集除了将偶像剧、恋爱剧的相关情节纳入其中之外,多以职场人际矛盾为主题。其“关注的或是职场竞争中的人们的言行、取舍、情感及事业间的关系,即所谓的‘成功学’;或是职场利益争夺中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以致最终演变成‘厚黑学’”。这就使得此类题材剧集“几乎演化成了‘职场权谋剧’,甚至是‘职场宫斗剧’”,进而“将‘职场’降格为仅仅容纳日常琐事和无病呻吟的‘战场’”<sup>[3]</sup>。如此,女性在职场中的主体精神与独立意识反而被消解于“权谋”与“宫斗”的无限重复当中。

从当前社会文化语境看,虽然男女平等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在性别议题上的共识,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性别平等仍然没有真正落实到具体层面;加之社会总体变革的速度与人们思想观念的革新并不同步,导致在家庭生活和职场竞争中,性别差异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权力差序仍客观存在。这也是此类剧集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内在原因<sup>[4]</sup>。在这类剧集中,“女强人”们看似性格刚毅坚强、做事雷厉风行,但她们坚强的外表依旧难掩内心的脆弱。例如,《都挺好》中苏明玉与原生家庭的和解,离不开石天冬的帮助;《欢乐颂》中小包总在安迪脆弱无助时悉心陪伴;等等。这无不透露出“女强人”的人设依旧没能走出男权逻辑范畴的尴尬,而剧集中男性人物的引导者身份与上帝视角本身就包含着明显的男权色彩。这种情节设定,在将现实中职场女性的困境进行梦幻化处理的同时,也将叙事逻辑重新拉回到了“男强女弱”式的刻板两性秩序之内。更何况,“女强人”这一身份标签本身就蕴含着女性在男权文化语境中陷入性别角色认同的危机,其成功的价值标准依旧建立在前者的文化逻辑之内。其正如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奠基者波伏娃在其代表作《第二性》中所指出的那样,“只要女人还在挣扎着去变成一个与男人平等的人,她就不能成为一个创造者”<sup>[5]</sup>。

在这里,“女强人”的概念内涵与“成功人士”“男性气质”等是有着内在精神关联的一组概念,而“女性独立”也就等同于“走出家庭”“不婚主义”等身份标签。其中所包含的二元对立思维显而易见。这类“女强人”最终的结局是:或者与世俗观念达成和解,再次回归家庭,如《都挺好》中的苏明玉、《三十而已》中的钟晓芹;或者沿着“女强人”的道路继续前行,但这条路势必充满孤寂,前途如何,亦不可知。再如,《都挺好》中的苏明玉和《安家》中的房似锦代表的是职场上事业有成但却受困于原生家庭带来的异化的代际关系和两性关系的都市女性形象。尽管她们在职场上获得了成功,但仍旧没能逃出男权主导之下“‘他者’的自我再生产”的社会文化环境<sup>[6]</sup>。她们的成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样的成功显然不代表女性在真正意义上找到了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三十而已》中的钟晓芹,最后选择回归家庭的原因是:她在成为畅销书作家后的种种经历,使她理解了丈夫陈屿的付出。然而,这种理解只是钟晓芹单方面的妥协,陈屿并未作出相应改变。《都挺好》中的苏明玉最后与父兄的和解也明显带有妥协的成分。由此看来,此类剧集仍然没有为女性人物形象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身份认同以及婚姻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冲突寻找到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

## (二)《我们的婚姻》对国产剧女性叙事框架的突破

有研究者在考察了近年来欧美与日本电视剧在建构女性形象方面的成功经验后,认为国产剧中女性角色塑造过于类型化,其要么是甜宠剧中的“傻白甜”,要么是职场剧中的“女强人”,在创作逻辑上过于单一。为了扭转这种创作倾向,“大女主戏”成为国产都市题材剧中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新方向<sup>[7]</sup>。然而,刻意求“大”也使这类剧集陷入过犹不及的境地,以至于《三十而已》中的男性人物被指为“全员渣男”,《都挺好》则落入“他视角”的旧圈套之中,《安家》中女主角房似锦的人物形象设定还是离不开原生家庭

的老生常谈,等等。这在一方面反映出都市题材电视剧创作者在构思方面同质化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爽剧路线的市场效益加剧了此类剧集的批量化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突破既定的叙事圈套,摆脱刻意营造戏剧冲突的爽剧路线,在充分体察社会现实与文化环境的基础上,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融合女性人物形象建构的合理性与叙事完善性的剧作,成为摆在电视剧创作者面前的现实挑战。电视剧《我们的婚姻》通过表现以沈彗星为代表的都市女性形象在平衡职场与婚姻家庭之间关系上的努力,尝试突破性别对立式的叙事框架,体现出平衡性别叙事话语的新趋势。

## 二、平衡性别叙事话语运用成为叙事新趋势

从最近几年都市剧创作来看,上述问题显然引起了创作者的注意。2020年上映的《安家》,力图摆脱职场女性沉溺于恋爱、角色设定过于悬浮等弊端,其剧情紧扣社会现实问题,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将大城市中小人物生存的艰辛展现得淋漓尽致,由此衍生出的人生百态引人深思。2021年上映的《理想之城》,同样避免了以往行业职场剧给人“悬空”“漂浮”感的“痼疾”,以颇为接近真实“地平线”的女性从业者的视角,“去滤镜”“无修饰”的视听影像风格,聚焦女性职场困境与成长焦虑<sup>[8]</sup>。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婚姻》延续了这一特点,其通过对沈彗星重返职场过程中种种经历的表现,牵涉出职场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两方面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如果说《理想之城》中的苏筱靠着顽强毅力和专业智慧向质疑者证实了自己的成功并非利用心机,其成长过程从正面挑战了落后的社会性别偏见,从而获得了女性主体地位的话,那么,《我们的婚姻》中沈彗星在平衡婚姻与职场的关系上同样体现出鲜明的独立意识。她没有像蒋静那样选择彻底依靠男人,而是在女儿长大后重返职场,利用专业知识为自己赢得了家庭与社会的尊重。此外,该剧的核心剧情没有过多放在巧合、误会、恋爱以及职场女性的“宫斗”上,而是紧贴问题本身,始终围绕着都市女性在婚姻与事业两方面的挣扎状态,在女性主义叙事框架中探讨

女性身份认同与自我价值实现的问题。该剧总导演沈严在接受采访时说,“最初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会觉得沈彗星很‘不一样’,她身上既有传统的中国式妻子顾家、承担家庭孩子琐事的本领,又是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曾经是学霸”;“沈彗星从起点上更代表了现在九零后一代对婚姻的想法,她们从来不觉得拿着一张结婚证就是一辈子的保证,而是希望能和对方并肩奋斗”<sup>[9]</sup>。可见,该剧从创作之初便包含了主创团队鲜明的性别平等意识。

### (一) 突出女性形象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

基于上述分析,与其说该剧讲述的是都市女性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婚姻模式的反抗,倒不如说其突出了女性形象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男性人物看似处处压制着女性人物,但仔细观察后可以发现,该剧中的男性人物更像是烘托女性追求独立精神的背景——正因男性人物的打压与歧视,方才显示出女性人物在追求人格尊严与独立精神时的坚决。例如,沈彗星与丈夫盛江川同为名牌大学金融硕士,所学专业相同,但结婚后,盛江川在事业上风生水起,而沈彗星则当了6年的全职妈妈。盛江川完全没有意识到她的付出,并且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当沈彗星决定重返职场时,盛江川的百般阻挠让她彻底爆发,并且更加坚定了她追求事业、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信念。在随后的剧情中,沈彗星在职场上的能力逐步体现出来,盛江川也在带娃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她的不易,这个微妙的转变实际上肯定了沈彗星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男性人物的所作所为,实际上起到了衬托女性人物形象性格转变的作用,并且,女性人物的转变也引起男性人物的反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女性人物的选择。在这里,男女主人公在家庭地位、人格尊严层面的差异逐渐趋于消弭,女性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以充分的女性视角切近当代都市女性的社会困境,从整体上勾勒一幅都市女性的生存图景,是女性意识在该剧中最直观的体现。

在人物角色设定上,《我们的婚姻》中的沈彗星与《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三十而已》中的顾佳、《我们都要好好的》中的寻找角色相似度很高。不同之处在于,罗子君与顾佳寻找的“觉

醒”是以走出家庭为前提的,她们在职场上重新找回自信的代价,便是家庭的破裂,而沈彗星则与丈夫盛江川达成和解,实现了婚姻与事业的双赢。从《我的前半生》到《三十而已》,再到《我们都要好好的》,女性重新确认自我价值的方式都是通过走出婚姻的牢笼、在职场打拼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尽管这种情节设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下都市女性的生存状况,但同类情节的反复套用也有意无意地夸大了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中的对立。《我的前半生》等剧作问题都提得很明确,但如何解决这一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这些剧作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的婚姻》则不同,在故事结尾,除了蒋静之外的其他女性人物形象,都寻找到了婚姻家庭生活与职场生活的平衡点,走出了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之间的矛盾冲突。尽管剧中涉及的种种话题并不新鲜,情节设置也中规中矩,但该剧不同类型的女性人物形象都体现出独立、自恰的特点。无论是当了6年全职妈妈之后重返职场的沈彗星,还是职场女强人的代表董思佳,抑或家庭主妇蒋静,她们都没有在婚姻关系中彻底迷失自我。即便是忍辱负重的蒋静,最后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毅然选择离开陆维斌,独自承担起抚养儿子的责任。

如果说《我们的婚姻》中蒋静和董思佳分别呼应了《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和《完美伴侣》中的陈珊的话,那么,沈彗星这一人物形象则显得颇为特别。她经历过全职妈妈的生活,懂得蒋静们的辛酸。她重回职场后从头做起,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华丽转变,与董思佳们比肩齐眉。更重要的是,她在婚姻与事业上的双赢结局,打破了都市女性在职场与家庭之间的截然对立局面,实现了男女双方在自我价值实现与婚姻关系良性互动问题上的融合。另外,为了凸显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的自主性,该剧特意塑造了蔡胜美这一女性人物形象。她作为沈彗星的母亲,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沈彗星的人生态度,给她树立了追求女性独立的榜样,而蔡胜美对沈彗星的影响,让沈彗星决定把这种女性独立精神继续传递给女儿盛糖;并且,当职场女性黎小田正在为意外怀孕这件事纠结时,也是沈彗星的一番话点醒了她,让她决定做一个职场妈妈。沈彗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同时,也赢得了公司的认可,

也使她与盛江川的婚姻关系重新恢复到平衡状态。董思佳最后对李宇文的表白也强调了家庭关系的稳定对于工作的重要性。可以说,该剧对职业女性兼顾家庭与事业并且获得双赢的结局,提示出该剧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走出了角色类型化的困境。

因此,该剧在打破观众对都市生活剧中女性人物在家庭与事业两难境地无法自拔的固有印象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在这里,对职场女性而言,家庭与工作不再是相互对立、彼此分裂的关系,而是相互成就、合作共赢的关系,这也就将该剧的主题思想以最鲜明的方式呈现给了观众。从这个角度看,该剧刻画了一组具有鲜明主体意识的女性人物形象,通过展现她们在婚姻、家庭、职场等关系中的困惑与选择,回答了都市女性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情感与尊严关系的问题。有研究者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发现:“中国女性在平等受教育、平等工作、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权利得到了基本保障,越来越多接受教育的女性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sup>[10]</sup>事实上,这也是当前国产剧重新塑造都市女性人物形象的重要现实依据。

## (二) 展现女性人物形象独立社会身份

此外,女性人物之间的相互帮扶,使该剧在塑造女性形象社会身份认同方面传递出别样的价值理念。如果说以往作品中职场女性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按照“宫斗戏”的情节模式展开的话,那么,在《我们的婚姻》中,职场女性之间的关系开始走向联合。她们在互帮互助中,获得了独立的社会身份认同。事实上,这种情节在《三十而已》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其反映出电视剧创作者尝试让女性角色互帮互助,自觉与男权文化视角拉开距离,力图站在女性的角度将主体性还给女性。在《我们的婚姻》中,这种女性个体人物之间的互助关系突破了《三十而已》将女性人物关系局限在闺蜜小圈子范畴之内的情节模式,而是从社会层面着眼,探讨职场女性之间的互助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职业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跳脱出了以往同类题材剧集的情节模式,并通过聚焦职业女性的社会身份认同,重构了职业女性的主体意识生成机制。也正因如此,蒋静的结局被设定为带有悲剧色彩,其意在否定

以她为代表的全职太太因对男性的过度依赖导致女性主体意识丧失的人生选择。结尾处,除了蒋静的结局比较凄凉之外,其他几位女性人物都在职场、婚姻与家庭中找到了她们的幸福。尽管蒋静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朋友的帮助,搬回了原来的高档小区,但其婚姻的失败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也传递出该剧特定的审美价值理念,即女性不应当彻底依赖男性来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保障,而应当主动寻求自我人生价值、保持人格独立意识。蒋静与其他几位女性人物形象之间的鲜明对比,将这一审美价值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此可见,扎实的问题意识使《我们的婚姻》跳脱出了以往同类题材作品惯用的爱情套路,其基于婚姻关系的情感线索也没有沉溺于甜宠剧的模式,而是在紧凑的戏剧冲突中一步步推进剧情的发展。其故事情节设定稳中求变,婚姻、职场、性别等故事元素使观众迅速熟悉了规定情境。与此同时,其打破单线条、模式化的情节模式,通过展现四对青年男女对婚姻关系的不同看法,多角度、立体化地呈现了都市女性在平衡家庭生活与自我价值实现之间的探索。整部剧始终把女性人物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平衡婚姻与事业关系作为叙事动力,这些极具代表性的社会议题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相比于那些披着都市职业剧外衣,实则充斥着偶像剧、恋爱剧内核的剧集,《我们的婚姻》所提供的剧情,更加贴合都市职业女性当下的生存状况与职业困境,这也标志着此类电视剧创作的变化已悄然发生。事实上,现代社会职场规则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正如飞虎资本总裁曹大仁所说,当下重男轻女的职场规则的制定者是父辈或者爷爷辈,因此这套规则实际上已经与时代脱节,但要将其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在沈彗星看来,重男轻女的职场规则之所以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改变,“那是因为现有规则对你们男的有利”,是职场“既得利益者”的男性在阻挠变革;另外,曹大仁将韵美海淘的失败归结为其负责人的女性身份这一点同样无法说服沈彗星。这些细节其实反映出该剧创作者已经开始对男权话语影响下职场环境出现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挖掘,尝试找出这一问题的源头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的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剧的问题意识以及对问题解决方案的探索,体现出都市题材电视剧在处理性别问题上的新趋势。

### 三、《我们的婚姻》创作具有突出的标本意义

从近10年都市题材电视剧创作来看,这类剧集在表现都市女性追求自我独立方面始终无法跳出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模式,其导致这类剧集尽管内容不尽相同,人物性格也因人而异,但在戏剧冲突与主题立意方面并无实质性的突破。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婚姻》中所体现出的新变尤为值得注意。不过,《我们的婚姻》在叙事话语上突破以往性别对立思维的同时,也有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思考的地方,对这些得失进行反思,或许可以为都市生活剧的创作提供相应的参考。

首先,该剧在探讨女性主义的过程中,并未矫枉过正,旁落男性视角。女性意识与女性主义并非意味着女性至上,而是意味着要尊重女性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这也是一种基于男女平等的价值诉求的合理表达。李银河在其《女性主义》中提出:“新女性主义的长期目标,应当从之前的男女二元对立到争取两性和谐,使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充足发展,从而实现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sup>[1]</sup>例如,该剧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职场男性在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之下所产生的精神焦虑问题。换句话说,尽管男性在现有职场中有一定的优势,但他们在享受这种优势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相应的责任与压力,正如盛江川所说,“这个时代一个男人事业要是不成功,这就是这个男人的原罪,这个社会不会同情你,也不会原谅你”。在陆维斌和蒋静离婚这件事上,盛江川旗帜鲜明地反对陆维斌的无耻行为,体现出男权社会内部的分裂。如果说以往同类题材作品中的男权话语是坚不可摧的整体的话,那么在《我们的婚姻》中,男权社会内部的分裂表明,男性话语的权威遇到了自身合法性的危机,从而间接反映出两性关系趋于平衡的走向。再如,蒋静一开始认为,董思佳的丈夫李宇文在家当全职爸爸说明他没有能力,言语之中带有明显的嘲讽意味,但是经过“划车风波”之后,她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认为他“至少是一

个非常合格的父亲”。不同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中刻意制造性别对立的叙事方式,该剧从相对客观的角度对现有职场环境中的性别问题展开了颇有深度的探讨。这种转变表明,传统男强女弱式的婚姻关系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主导地位正在发生改变。

其次,该剧在聚焦都市女性人物形象、探寻现代个体女性人物关系变化的同时,其在反映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也表现出平滑无力的一面。正如评论者所言,“如果说,‘霸道总裁爱上我’式的言情剧、甜宠剧是以甜蜜爱情的书写来粉饰两性关系中存在的性别、阶层权利的不平等;那么《我们的婚姻》则以女主角顺畅的职场之路美化了全职妈妈重返职场道路的艰辛,从而使女性的现实困境再度被遮蔽”<sup>[2]</sup>。尽管该剧对女性的社会身份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探讨,但是其将这类问题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归结为两性婚姻问题,实际上是对问题的根本原因的讨论。因此,该剧大团圆的结局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女性的现实困境及其复杂的社会成因。另外,在人物设定上,该剧饱受诟病的一点就在于,剧中人物的精英身份给人一种“悬浮感”,其无法切入普通百姓的人生困境。

再次,男性人物依旧扮演着引导女性人物走出困境的角色,这表明虽然该剧有意识地平衡性别叙事的关系,但是在潜意识层面却依旧未能走出男权话语的范畴,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当沈彗星在无法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关系而焦头烂额甚至趋于崩溃时,是父亲和三位老年男性创业者的一系列劝慰才使她重新找回自信,度过了职场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当董思佳和李宇文的婚姻出现危机时,董思佳呈现出来的脆弱性格彻底颠覆了她在职场上的“女强人”形象。她无法接受离婚带来的巨大伤痛,最后经过年长男性丁平山不经意的点拨才恍然醒悟。

最后,该剧在赞扬女性人物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对男性人物进行了矮化处理,从而导致该剧依旧保留着二元对立的叙事痕迹,这显然是受到了先前同类作品的影响。无论是《三十而已》中逃避家庭责任的许幻山、以冷暴力对待妻子的陈屿、对感情不忠的梁正贤,还是《完美伴侣》中冷酷无情的林庆昆,男性人物形象在这类剧集中无不

表现出自私、傲慢甚至专断的特征,这种人物角色设定固然可以增强戏剧冲突,但过分强调性别之间的对立,无疑使这类剧集的人物设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也使得性别差异的问题始终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在《我们的婚姻》中,同样不乏这类被矮化的男性人物形象。韵美海淘老板贺韵美的男朋友凯文就是依靠取得女性欢心混吃混喝的典型代表,而投资行业的佼佼者陆维斌则是一个毫无家庭责任感的自私自利的资本家形象。这类人物形象在剧中扮演了小丑的角色,成了引诱成功女性堕落的邪恶力量。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近年来女性都市题材电视剧在表现都市女性的生活境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以《我们的婚姻》为代表的剧集在平衡性别叙事话语方面的尝试,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同类题材作品过于突出性别对立的叙事模式,为此类电视剧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样本,但是,这个转变与突破的过程同样带有先前作品的痕迹,这就提示我们,既要看到此类剧集所取得的成绩,也不应回避其中的问题。如何在吸收其成功经验的同时,更好地规避这些问题,无疑是目前女性都市题材电视剧创作的重心所在。

一部优秀的都市生活剧除了展现婚姻、情感本身之外,还应当具备深刻的思想主题和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社会议题。例如,2007年上映的《金婚》在日常琐碎中融入对夫妻关系的深入思考,在带给观众审美享受的同时,引发人们对于婚姻关系的重新认识;2009年上映的《蜗居》以房价飙升为背景,反映了普通人在这种生活环境下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不乏启示意义;2019年上映的《小欢喜》则围绕三个家庭中孩子的高考问题,从正面探讨了孩子教育的问题;等等。反观《我们的婚姻》这部剧,尽管它沿用了以往同类题材的创作模式,但无论是情节设定还是人物形象塑造,并无太大的新意,只是在主题思想上,该剧对都市女性在婚姻、职场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主体意识进行了新的探

索,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同类剧集在思想立意方面过于突出性别对立的观念化倾向。随着市场环境和文化价值的多元化,都市剧要想更好地反映当下的都市社会生活,如何“破题”是关键。《我们的婚姻》的“破题”之处,就在于它从女性的社会身份、家庭责任以及主体意识等方面,重新探讨了都市女性人物在职场与婚姻家庭之间寻求平衡点的过程,展现出女性叙事视角下性别叙事由分裂走向融合的新趋势

#### 参考文献:

- [1] 罗宾·沃霍尔-唐.形式与情感/行为:性别对叙述以及叙述对性别的影响[J].王丽亚,译.江西社会科学,2008(1):27-31.
- [2] 李敏.走向真职场真独立:都市职场剧女性形象嬗变[N].中国妇女报,2021-09-07(6).
- [3] 陈红梅.实干理想主义者的职场成长史:《理想之城》的创新表达与职业剧反思[J].当代电视,2022(1):47-53.
- [4] 赵瑜,李孟倩.性别、年龄与家庭:评《三十而已》的女性主义叙事[J].文化艺术研究,2022,15(1):105.
- [5]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508.
- [6] 董军.当代女性题材电视剧创作中的“她者化”危机:以电视剧《都挺好》为例[J].中国电视,2019(8):41-45.
- [7] 刘晴.谈都市题材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建构策略[J].中国电视,2020(12):51.
- [8] 陈旭光.《理想之城》:一部透视职场生态与人性冲突的诚意之作[EB/OL].[2024-05-18].<https://mp.weixin.qq.com/s/NIuR-8STk5yrAbEnG4dWSg>.
- [9] 电视剧鹰眼.《我们的婚姻》导演沈严、刘海波|变化的婚姻和变化的我们[EB/OL].[2024-05-18].[https://mp.weixin.qq.com/s/4S3JZRKTJIQH\\_MetotMVuA](https://mp.weixin.qq.com/s/4S3JZRKTJIQH_MetotMVuA).
- [10] 傅异星.《送我上青云》:都市独立女性影像书写的新境界[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7(6):71-77.
- [11] 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85.
- [12] 蔡郁婉.评电视剧《我们的婚姻》:切近的表象之下,是对现实的再度远离[N].文汇报,2022-03-25(1).

责任编辑:黄声波